

江淮方言间接引语标记“说的”向语气词的词汇化

张爱玲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江淮方言中“说的”是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标记相关信息是言者从他人那里道听途说而来。在道听途说来的信息真值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的特定语境下,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说的”词汇化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句末语气词。从间接引语标记向反预期标记的演变还见于上海话“伊讲”、台湾闽南话“讲”和日语って(tte)。所不同的是,演变出的反预期标记是句末语气词,还是句中语气副词,抑或句末语气助词。这取决于演变前的间接引语标记是前置型还是后置型,是孤立型还是黏着型。江淮方言“说的”的历时演变可以从该方言中“说的(话)”的共时多功能性中窥见一斑。

关键词:间接引语标记;传信标记;反预期;说的;(伊)讲;说的(话)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1-0061-04

在江淮方言盐城话、扬州话和南通话中“说的”是个语气词,固定地用在陈述句的末尾。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解释道:“说的”表示对所陈述的情况的不满,有时兼有感叹意味。例如^[1]:

(1)叫他写报告,他弄块在这里下棋说的。
(扬州话)

(2)小王出差去了,没有能看到这场球赛说的。
(扬州话)

(3)小王努力工作,还没有拿到奖金说的。
(南通话)

例(1)中说话人期望当事人此刻应该在写报告,而事实上当事人正在下棋。说话人通过在“他弄块下棋”的句末后附语气词“说的”,来传达出反预期意义和他对当事人饱含不满的责备语气。例(2)中说话人推测小王这样的球迷应该能看到这场球赛,而事实上小王因为出差错过了这场精彩的球赛。说话人通过在“没有能看到这场球赛”的句末后附语气词“说的”,来传达出反预期意义和他对造成小王错过精彩球赛这件事的责任方的不满情绪。例(3)中说话人预料像小王这样努力工作的人应该能拿到奖金,可事实上小王

没有拿到。说话人通过在“还没有拿到奖金”的句末后附“说的”,来传达反预期意义和他对造成小王这样努力工作的人都拿不到奖金的责任方的饱含不满的责备语气。综上所述,语气词“说的”句的语用背景是:

说话人根据常情、常理预测或期望出现或发生事件S

事实上发生的事件跟S正好相反(记为:~S),出乎说话人的预料或期望

说话人需要对导致~S这种反预期事件的责任人实施责备

可见,表示不满语气的用法当是从表示反预期语气的用法演变而来。表示反预期的语气(即惊讶语气)才是“说的”的第一性用法。那么,这种传达反预期意义和饱含不满的责备语气的语气词“说的”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尝试从间接引语标记的词汇化角度对此作出解释。

一、从江淮方言中“说的”的共时多功能性看其历时演变

考察可知,江淮方言(如盐城话)中“说的”,又写作“说底”,还是个后置型从属标注类间接引

收稿日期:2014-02-18

基金项目:2012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SJD740006)

作者简介:张爱玲(1975-),女,江苏丰县人,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词汇。

语标记。“后置型”指间接引语的标记后置于引语,而非前置于引语。“从属标注类”指关系标记是标注在从属成分(如引语)而非主要成分上的。根据张安生转引汪维辉的研究,“道”和“说”这两个近代汉语阶段最活跃的言说动词事实上在元明之季具有OV倾向的“蒙式汉语”白话文献、特别是直译本文献里就已经有了后置从属语标注的用法^[2]。如:

(4)去年秋间,“贼每多有”麽道听得有。(校点本《元典章·刑部》:183)

(5)色目人“做了几遍?”麽道问了。(校点本《元典章·刑部》:184)

(6)帖木真说:“我的马被人劫了。”说了。(校勘本《蒙古秘史》第二卷总译:943)

例(6)中的“说了”与盐城话里的“说的”相类似。盐城话里的“说的”的类型学价值:表明类型学总结出的“VO语序、前置词与‘引语标记+引语’是和谐的”这条规律只是倾向性的,也有例外。这种例外可能是汉蒙语言接触的结果。

“说的”作为后置型从属标注类间接引语标记表示相关信息是一种传闻,是说话人道听途说而来。例如:

(7)人家急死了,巴不倒_{恨不得}他没个_{明个,明天}来,他反好呢,没时间来_{说的}。(盐城话)

上例中“说的”本来是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表示其前的“(他)没时间来”是说话人转述第三方“他”的话。或者说,是传信标记(evidential marker),表示“(他)没时间来”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信息。末句的字面意义就是“‘他没时间来’,这是他说的”。但是,当说话人用“说的”来转述第三方“他”的话时,他附加上了自己的主观色彩,即不相信、否定和贬斥的主观情态。比如,在上例中“说的”还暗示说话人不相信第三方所说的话。换言之,说话人不相信第三方没有时间来。由于间接引语标记“说的”经常出现在这种带有怀疑、贬斥和否定的主观情态的话语中,它逐渐将这种表示怀疑、贬斥和否定的主观情态吸收为它的主要用法,而将其间接引语标记用法边缘化。这样,“说的”就有可能发生从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向句末语气词的词汇化。例如:

(8)他的名字叫小三子_{说的}。(盐城话)

(9)那本书名叫《白鹿原》_{说的}。(盐城话)

例(8)中“说的”既可以解读为语气词,表示说话人对“他的名字叫小三子”这个命题的不相

信和否定的主观情态;又可以解读为间接引语标记,暗示第三方“他”对说话人说过“我的名字叫‘小三子’”这样的话。例(9)中“说的”可作类似分析。这说明,例(8)(9)中“说的”正处于从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向句末语气词的词汇化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依违两可的过渡状态。而当“说的”所依附的宿主小句不可以理解为对第三方的话语的转述时,“说的”就只能理解为表示怀疑、贬斥和否定情态的句末语气词。例如:

(10)叫他做生活_{干活},他在葛里_{这里}下棋_{说的}。(南通话)

例(10)中“他在葛里下棋”不可能是说话人所转述的第三方的话语(即间接引语),而只能是说话人自己对第三方的当前行为的陈述。因此,该例中“说的”只能解读为表示主观情态的语气词。“说的”从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向句末语气词的词汇化完成的形式标志是,“说的”可以与言说动词充当的谓语中心共现。例如:

(11)他说他没时间来说_{说的}。(盐城话)

(12)他说让你早点回来_{说的}。(盐城话)

上两例中,“说的”依附的宿主——小句“他没时间来”和“让你早点回来”——前已经有“他说”来标记它的引语性质。这说明这两例中的“说的”已经词汇化为表示主观怀疑、贬斥和否定情态的语气词。

二、来自外语和其它方言的旁证

位于句末的、包含言说动词的语言表达式(如汉语方言中的“说的”、“的说”、“伊讲”等)往往会从间接引语标记演变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语气词。比如李佳樑发现,上海话中位于句末作为传信标记(标志着相关信息是一种传闻)的“伊讲”已经演变出表示主观惊讶语气的语气词的用法^[3]。例如:

(13)(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后)明朝40度伊讲!(上海话)

上例既可以解读为“(天气预报员)他说明天40度”,也可以解读为“明天竟然40度”。作前一种理解时,“伊讲”是传信标记;作后一种理解时,“伊讲”是表示反预期意义的主观化标记。江淮方言中的“说的”在表示反预期语气的同时,还兼有表示不满语气的用法。这说明:江淮方言中的“说的”比上海话中的“伊讲”的主观化程度更高。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海话“伊讲”中的

“伊”——一个表示信息最初来源——的单词还没有脱落。所以,它的表示信息来源的用法向表示反预期意义的用法的主观化还没有达到更高级的阶段。而江淮方言里的“说的”中没有表示信息最初来源的“他”。因此,结构的语义透明性(或可分析性)已经没有“伊讲”强。所以,它已经达到主观化的高级阶段。再如,在台湾闽南语中间接引语标记“讲(在厦门、漳州读[kan]或[kɔŋ];在泉州读[kɔŋ])”也演变出了表示反预期意义的用法^[4]。例如:

(14)讲有取款人啦!(台湾闽南话,‘竟然有这种人!’)

(15)讲台湾会出取款代志啦!(台湾闽南话,‘台湾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跟江淮方言中“说的”、上海话中的“伊讲”从间接引语标记演变为句末语气词不同的是,台湾闽南话中的“讲”从间接引语标记演变为句中语气副词。这是因为,江淮方言中“说的”、上海话中的“伊讲”是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而台湾闽南话中“讲”是前置型间接引语标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江淮方言中“说的”、上海话中的“伊讲”和台湾闽南话中的“讲”都例示了“传信标记>反预期标记”的语义演变规律。

现代日语中的道听途说类传信标记って(tte)同样也已经发展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用法。试比较:

(16)ぼくが そう 言ったって。

我-主语标记 那么说-过去式-传闻标记
(‘他说我那么说过。’)

(17)(说话人发现从某网站能免费无限下载到迪斯尼的主题模板)

わあ、こんどは

感叹词 这次-话题标记

ちずにいいでこめが

迪斯尼主题邮件-主语标记

とりはおだい だ って!

无限下载 系词 惊讶语气

すちっち だ って!

史蒂奇 系词 惊讶语气

みにい だ って!

米妮 系词 惊讶语气

みっきい だ って!

米奇 系词 惊讶语气

(‘哇!(惊讶地)现在迪斯尼的主题邮件模板可以无限下载了!(惊讶地)史蒂奇!(惊讶地)米妮!(惊讶地)米奇!’)(转引自李佳樑2011)

例(16)中的って_て是传信标记(相当于と_ということだ、と),表示“我那么说过”是说话人转述他人的话。例(17)中的って_て是反预期标记,表示相关事态的出现是出乎说话人的预期的。

当然,含有言说动词的传信标记也可能演变为交互主观化标记,表示说话人为了尽量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减少对对方面子的损害,而委婉地借第三方的口吻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目前网络上流行的“的说”就是如此。“的说”在网络交际中的使用最晚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主要出现在港台地区人士使用QICQ等即时通讯软件的交流中以及港台地区流入大陆地区的动漫音像制品的繁体字幕中^[5]。例如:

(18)你很无聊的说。

(19)天好热的说。

(20)那衣服很漂亮的说。

例(18)中,说话人认为对方很无聊,但不便于直言自己的看法。于是,通过“的说”,借用第三方的口吻迂回曲折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言外之意,“你很无聊”是别人说的。例(19)(20)中“的说”表示“天好热”、“那衣服很漂亮”不是说话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别人这么说的。

三、从江淮方言中“说的(话)”的共时多功能性看“说的”的历时演变

在江淮方言盐城话和扬州话里,“说的话”表示“S只是说话人个人说的话,不代表大众”或者“自己只是口头说说,未必真的相信S为真”,暗示听话人不要当真或不要较真。其中的“的话”的作用是把事情往小里说、轻里说,意在弱化自己言语的重要性,带有对对方的安慰色彩,意在回应对方的担心或指责等,是个交互主观化标记。例如:

(21)嗯_我只是说的话喽,你吵什么?(盐城话)

(22)这是说的话,不要当真。(盐城话)

例(21)中的“说的话”表示“随便说说而已”。所以,这里的“的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而已,罢了”。这种现象启发我们:在江淮方言中,“S说的”结构里的“说的”之所以能从间接引语标记词汇化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语气词,是因为

该结构的字面意义是:S,这是他说。言外之意,即便说话人自己——他——也未必确信 S 为真。所以,作为转述者的“我”更可以怀疑 S 的真实性。而事实上转述者发现 S 为真。这样,最终的发现和转述者“我”的心理预期相反。因此,当“说的”词汇化为语气词时,表示反预期意义。有时为了凸显口头言说和实际情形的对照关系,可以在“说的”前加上工具状语“嘴”。例如:

(23) 他也嘴说的不喽,哪会那么快就写好呢?(他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说的话”经历了重新分析,重新分析前:(说的)+话;重新分析前:说+(的话)。

上文,我们考察了江淮方言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说的”向表示反预期意义的语气词的词汇化过程。考察发现,江淮方言后置型间接引语标

记“说的”最初只是个传信标记,传达信息的来源是道听途说。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向表示反预期意义的语气词的词汇化还见于上海话的“伊讲”、日语中的“って”。从间接引语标记向表示反预期意义的词语的语义演变还见于台湾闽南话中的“讲”,只不过因为台湾闽南话中的“讲”是前置型间接引语标记,它最终演变成为的是语气副词而非语气词。从引语标记向语气(副)词的演变是一种语义的主观化。当前,网络流行语中的“的说”的形成体现的则是引语标记(即道听途说类传信标记)的交互主观化,即由引语标记逐渐演变为标示言者对听者面子的关注(尤其是对听者质疑权利的尊重)的标记。本文还从江淮方言中交互主观化标记“说的(话)”的共时多功能性角度来旁证相关演变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南通方言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49.
- [2] 张安生. 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J]. 中国语文,2007(4):343-356.
- [3] 李佳樑. 当传闻不再是传闻——论上海话表示“惊异”的语用标记“伊讲”[A].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4-163.
- [4] 司马翎. 生成语法规理论与汉语语气词研究[A]. 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64-374.
- [5] 秦岭. 说“的说”. 语言文字应用[J]. 2010(2):56-62.

The Lexicalization of “*Shuo di*(说的)” in Jianghuai Dialect from a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to a Particle

ZHANG Ail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Shuodi*(说的)” in Jianghuai dialect is a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as a postposi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cerned is heard from others. The information heard from others is uncertain in truth value. In the context that information heard from others being oppugned, the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Shuodi*(说的)” may lexicalize into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expressing counter-expectation meaning. The change from a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to a marker for counter-expectation meaning is universal, such as “*Ikā*(伊讲)” in Shanghai dialect, “*Kan/Kōn*(讲)” in Minnan dialect spoken in Taiwan, and “*Tte*(って)” in Japanese. What characterized by them is that, they changed into a mood adverb before predicate or rather than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although also expressing counter-expectation meaning. All those depend on whether the source expressions as markers of indirect citation are before or after their hosts, and whether the language which the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belongs to is isolative or agglutinative. In Jianghuai dialect,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Shuo di*(hua)(说的(话))” i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Shuodi*(说的)” in some degree.

Keywords: marker of indirect citation; evidential marker; counter-expectation; *Shuodi*(说的); *Ikā*(伊讲); *Shuo di*(hua)(说的(话))

(责任编辑:李 军)